

窥海斋 林少华专栏

少不入川,老不出蜀



林少华，海边的卡夫卡等日本名家之作凡五十余种。有村上春树和他的作品《失落之美》、《乡愁与良知》、《为了灵魂的自由》。译有《挪威的森林》。林少华，著名文学翻译家、学者，亦从事文学创作。现为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。

成都一所大学打来电话，邀我去讲学。我略一迟疑，对方当即补充说：“成都桃花开了！”桃花？讲不讲学另当别论，就凭桃花也值得跑一趟，何况还有武侯祠和杜甫草堂。

桃花城里无多，先看两处古迹。武侯祠，三国圣地，“蜀相祠堂何处寻，锦官城外柏森森”；杜甫草堂，文学圣地，“万里桥西一草堂，百花潭水即沧浪”。可见当时俱是在城外的。而现在显然位于城里，搭出租车不出二十分钟即到。仅仅看完这两处，我就得以确认成都是全中国最幸运的城市。武侯祠诸葛亮孔明，无疑是政治家的楷模，他的鞠躬尽瘁、勤政爱民，足以使当代许多自称人民公仆的政治家汗流浃背；杜甫草堂杜工部，堪称知识分子的楷模，他的穷且益坚、忧国忧民，足以让我等当代大部分知识分子自惭形秽。而这两位民族先贤最主要的纪念建筑都在成都，就在成都！在他们面前，我不能不反省自己的精神格局，不能不审视自己生命的维度和高度，甚至感到自己灵魂的卑微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我的确羡慕成都人，至少他们比我多一次拯救。自草堂折回武侯祠，已是日落时分，祠内人影寥寥。往来徘徊，但见古柏森森，殿宇巍巍，但觉塑像凛凛，晚风瑟瑟。隔叶黄鹂未闻，映阶碧草隐现。抚今追昔，心潮起伏，久久不忍离去。

岂料，从武侯祠出来，仅一墙之隔，便是成都当今有名的休闲景区“锦里”。清一色仿古建筑，青砖灰瓦，雕梁画栋，曲径回廊，宫灯高悬。酒肆茶楼，鳞次栉比，红男绿女，往来如织。比之武侯祠，俨然另一世界。刚才高扬得神经顿时松弛下来。转了几圈，出来时已是夜间十点，而仍有人蜂拥而入。谈笑风生，几乎全操本地口音。问出租车司机，答曰要到下半夜三点方能歇息。“少不入川啊！”他淡淡一笑，好像有几分无奈，又似乎带几分自豪。难怪这里一位老师告诉我：成都一位女生和一位从青岛来成都读大学的男生谈恋爱，暑假跟他去青岛，只住两天就住不下去了，抱怨青岛太冷清，没好吃的，没好看的，没好玩的，大海老看着啥子好看的哟！一来二去，青岛男孩毕

业也不愿回青岛了，“喏，少不入川啊！”我心中暗想，同是山东人，当年诸葛亮入川是为了北定中原兴复汉室，而这小子连一个成都女孩都“征服”不了。

翌日驱车一小时去郊外看桃花，领略“农家乐”。作为男人，路上难免想入非非，在脑海中反复勾勒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”的诱人场景。是啊，村庄，柴门，村姑，桃花，经典的乡间风光，秀才艳遇，到了！到了！本想弃车步行，却见一条水泥路直插进去；村庄也很难说是村庄了，到处是不伦不类的水泥建筑，柴门成了铁门，村姑成了壮汉——一位四十岁的男子从公路旁把我们的车领来这里。他在前面骑摩托车带路，摩托车后座插着两三枝桃花，说不清是滑稽还是浪漫。

好在桃花没有异化，没有一下子变成塑料花铝合金花什么的。铁门一侧矮些的平地上，二三十株桃树如彩霞一般铺展开来。少数含苞欲放，大部分已经绽开粉红色的五枚花瓣。轻盈，娇嫩，怯生生的，甚至有些虚幻，令人不敢久看，生怕倏然消失不见。最有情调的当是同邻院桃园之间的竹篱小径。虽长不过二十米，但因有两侧桃花遮掩，颇有几分深邃感。踱步其间，不由得想起“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”。不仅桃花盛开，桃花下还一丛丛开着金灿灿的油菜花，油菜花下一簇簇开着蓝莹莹的太阳花，太阳花下开着一朵朵黄嫩嫩的苦菜花。高低错落，层次分明，十足的“农家乐”。可惜没有蜜蜂，没有蜜蜂的嗡嗡声。

是的，是没有蜜蜂的嗡嗡声，汽车的马达声和喇叭声倒是不小。我走出小径，穿过一片菜圃，爬上水泥坡路四下望去。这时才完全看清楚，桃花树下的餐桌比桃花树本身还多。几乎每张餐桌旁都坐满了游客。今天分明是星期三，游客又多是年轻人和中年人。我感到奇怪，成都怎么会有这么多闲人——该上学的不上学，该上班的不上班，这算怎么一码子事呢？问之，成都同行告曰：“成都是休闲城市，少不入川嘛！”我笑说：幸亏我老了。对方立马提醒：“下一句是‘老不出蜀’。你就别回去了，聘你当客座教授如何？”



韩松落，西北人，居河北，写专栏，做小说，看电影，用文字使生命纹络繁密，用影像使人生体验增值。

江湖再见 韩松落专栏

他原谅,不是你原谅

电影《影子爱人》发布会上，身为女主角的张柏芝缺席。相较于“生病”、“档期”等没有说服力的理由，导演关锦鹏的解释比较实在：“这是张柏芝个人的事情，我没问，也不方便问，但是相信大家看到最近的一些报道，她家里确实发生了一些事情，让她感觉很疲惫。”联系张柏芝在母亲节当天，与陈冠希在由台返港的飞机上相逢并玩自拍，谢霆锋接连缺席张柏芝和次子生日聚会的诸多消息，很难不让人有所猜测。

“隐私照”事件后，最为人称道的，是谢家的各种“原谅”，许多段落，已经流传到脍炙人口，比如谢霆锋说，自己没去看那些照片；比如狄波拉在最艰难的时刻，送了一件礼物给张柏芝，“是两个娃娃抬着一块荷叶，刻着‘风雨同舟’四个字。”在陈冠希现身加拿大作证，确认了张柏芝是照片中人后，这一家人用常态作为回应，丈夫谢霆锋照常开工，公公谢贤接受记者采访说：“我真是爱到她晕，疼到她晕！她怎样都是我的好媳妇，超过100分！”张柏芝之所以能够顺利复出，固然得益于她刚烈的性格，却也与谢家人的表现有关，人家都泰然处之，旁观者的口水四溢立刻显得多余。这种态度犹如杠杆，撬起了张柏芝的位置，她复出之后，身价暴涨三倍。

但原谅，貌似是单方面的举动，其实是双簧戏，世界上大部分的原谅，都得建立在被原谅者不肯自我原谅的基

础上。即便最高姿态的原谅者，最宽厚的内心深处，仍有一点小小的自私，希望对方知道，自己被原谅了，自己有亏欠，以低姿态接受原谅的甘露。原谅，极度需要被原谅者的配合，如果被原谅者倒自我原谅了，原谅就无法实现，已经出发的原谅，顿时失效。

就像电影《密阳》。当女主人公去原谅绑架和杀死自己儿子的罪犯时，却发现他已经找到了自我原谅之途，愤恨立刻重来，整个世界观也随之崩溃；就像电影《唐山大地震》中徐帆扮演的李元妮，因为做出了一个“索菲的抉择”，从此再不能“花红柳绿地活着”，她得以自己对自己的不原谅，以自我惩罚，祈求假想中的被原谅。而张柏芝与谢家人的原谅配合的，就是不肯自我原谅：“我承受这个错，自我惩罚，这一年我没见有人。”但陈冠希的再度相逐，尤其是，再度触及刺激性的“自拍”，她就会被认为是提前实现了自我原谅，脆弱的原谅随之崩塌。

与这种原谅和被原谅的角力相比，张柏芝对陈冠希的原谅，又显得太轻易了。在飞机相逢事件后，陈冠希大方地陈述细节，比如是张柏芝用自己的相机拍合照，照片还在她手里，“你们知道我们感觉是好的，这就够了！”而来自谢家的原谅，有很大一部分得托赖于张柏芝对陈冠希的不原谅，她原谅了，这场原谅博弈的柱子，就倾倒了。

还原鲁迅 张映勤专栏

鲁迅为何不喜欢绍兴



张映勤，中国作协会员，一级作家，编审，文学杂志主编。著有《话剧讲稿》、《世纪忏悔》、《死亡调查》、《20个浙浙浙远的城市记忆》、《佛道文化通览》等。另发表有小说、散文、评论若干。

两年内三次到绍兴，到绍兴必不可少的内容是参观鲁迅故居。

最近一次到绍兴是在2010年9月，匆匆忙忙又看了一遍鲁迅故居。我边走边想，鲁迅为什么不喜欢绍兴，不愿意说自己也是绍兴人，自1919年底第一次离开家乡，直到1936年去世，17年里再也没有回过老家？这里面一定有值得玩味的理由。

周作人曾分析过绍兴人为什么不喜欢“绍兴”：“第一是不够古雅，于越起自三代，会稽亦在秦汉。绍兴之名则是南宋才有。第二是小康王南渡偷安，但用吉祥字面做年号，妄意改换地名，这是很可笑的事情。第三是绍兴人满天飞，《越谚》也登载‘麻雀豆腐绍兴人’的俗语，谓三者到处都有，实际上是到处被人厌恶，即如在北京这地方绍兴人便很不吃香，因此人多不肯承认是绍兴人；鲁迅便是这样，人家问他籍贯，回答说是浙江。”

周作人分析的理由有些牵强。绍兴古称越，会稽，春秋时代是越国的都城，南宋高宗赵构以“绍祚中兴”激励自己，改越州为绍兴，把它作为临时首都，绍兴有继往开来、繁荣昌盛之意，这个名字还不够古雅吗？比它直白稚拙的城市名称无以计数。“绍兴人满天飞”，说明绍兴人脑子活，识时务，生存能力强，看不出有什么贬义。

倒是绍兴师爷的说法多少影响了绍兴人的名声。绍兴师爷处世精明，八面玲珑，做事审慎，善于言辞，但同时又奸刁乖巧，工于心计，诡诈多端，嗜爱钱财，给世人留下不好的印象。当年跟鲁迅打过笔仗的梁实秋，就曾鲁迅的籍贯加以讽刺，说因为他是绍兴人，便“也许先天的有一点‘刀笔吏’的素质，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”。陈西滢、苏雪林也就这一点攻击过鲁迅。可见，师爷、刀笔吏这种名声都是鲁迅所忌讳的。但是师爷毕竟是一定地位，有一定文化专长的读书人，不是穷苦下层引车卖浆者所能为，这不应该是鲁迅从感情上抗拒绍兴二字的理由。

一般来说，一个人的少年经历决定着他的行为走向，决定着他的性格特点。我们不妨从少年鲁迅身上寻找原因。

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绍兴一个宦官家庭，但在13岁那年，祖父周介孚因科场舞弊案入狱，此后父亲又长期

患病，终至死亡，家道迅速衰落。少年的鲁迅经常出入药店和当铺。家庭的败落让身为长子的鲁迅过早地背负了沉重的家庭负担，品尝到生活的艰辛，这当然给他心理上留下了深刻的阴影。

鲁迅的祖父周介孚33岁(1871年)考中进士，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，曾在京做官。因此，科场舞弊案在当时的绍兴肯定是轰动一时的新闻，甚至是丑闻，这种不好的名声给家属带来的精神压力不可谓不沉重。其后父亲重病缠身，鲁迅一度生活在紧张焦虑惊悚的状态中，他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因为生活变故带来的心理落差，经济压力，更是精神上的压抑。请注意这一句话：“在海蕙里接了钱……”我以为，让鲁迅感到海蕙的决不仅仅是质铺里的伙计，也许还有周围数不清的熟人，甚至是同族亲人。

父亲去世以后，有一回家族聚议，重新分配房屋，亲戚本家欺负鲁迅家，要把坏房子分给他们，鲁迅称祖父还在狱中，坚决不肯签字，由此引起一位本家长辈的厉声呵责，这件事给他造成很大的心理阴影。1919年12月初，绍兴老屋由新台门六房联合出卖，年初的时候，他在给许寿裳的信中提及此事：“明年，在绍之屋为族人所迫，必须卖去，便拟挈眷居于北京，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。而近来与绍兴之感情亦日恶，殊不自至(知)其何故也。”变卖绍兴老屋是因为“为族人所迫，必须卖去”，这里面很可能与族人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。即使是本家亲戚，也因为家庭的变故，变得冷酷和势利起来，这不禁让敏感的他对家乡和家乡人产生一种憎恶心理。正是在绍兴，鲁迅第一次看到了社会人生丑恶无情的阴暗面，让他对故乡在感情上产生了隔膜，这是后来鲁迅不愿提起绍兴、不喜欢绍兴的原因之一。

另一个造成鲁迅不喜欢绍兴的原因，我以为和他的夫人朱安有关。朱安也是绍兴人，鲁迅对这一段婚姻痛心疾首，称：“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。”绍兴不仅促发了鲁迅一段噩梦般的痛苦婚姻，还是他们夫妻两人的共同故乡，在鲁迅的感情生活中，这无疑是一处伤心之地。

痛苦的少年经历，不幸的婚姻生活，这也许才是鲁迅不喜欢绍兴的真正原因。

心理红楼 吴克成专栏

鲜花长在牛粪上



吴克成，教师，心理咨询师，专栏作家，开有音乐、绘画、摄影、心理专栏若干，著有《迷途——西方流行音乐名家》。

“有人看着是一朵花，有人看着是豆腐渣”，这话说得真是一点不差。现代人做事讲求短平快，到月球拜访嫦娥，恨不得抬抬脚就已坐在她家的炕头上。所以现在不管干什么都快，火车、动车的车轮，转得一年比一年急。人人都欢呼雀跃。但如果已故音乐家吉奥吉诺·罗西尼泉下有知，能气得从坟墓里翻身坐起来，张口开骂。

罗西尼是意大利音乐家，他出生于1792年，代表作是《塞维利亚的理发师》。据说他健在的时候，每天中午一点钟都会准时出门——戴着假发，遮着寸草不生的脑袋。碰见第一个马车夫，他一定会寒暄并向人家：“你的马儿们累吗？”如果马车夫回答“不累”，罗西尼绝不会坐他的车——他只相信疲惫的马，而且终生没有坐过火车。哪位如果出于好心，想让他尝尝坐动车或乘飞机的滋味，他大概二话不说，扭头就去法院告你个一级谋杀。

小偷向来人见人厌，但也有为小偷开脱的。《红楼梦》第六十一回《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》里，丫头彩云为贾环欢心，偷了太太的玫瑰露。王熙凤是这样说的：“依我的主意，把太太屋里的丫头都拿来，虽不便增加拷打，只叫她们垫着磁瓦子跪在太阳底下，茶饭也别给吃，一日不说跪一日，便是铁打的一日也管招了。”平儿却是这样想：“何苦来操这心！‘得放手时须放手’，什么大不了的事，乐得不施恩呢……”

第六十二回里，她是这样了结的公案——平儿吩咐林之孝家的道：“大事化为小事，小事化为没事，方是兴旺之家。若得了一点子小事，便扬铃打

鼓地乱折腾起来，不成道理，如今将她母女(指关起来的柳五儿和柳家的)，照旧去当差，再不必提此事。”

心理学家把这不同的处事方式归因为认知。美国心理学家沙赫特发表过情绪认知理论，他认为，任何一种情绪，都是外界环境刺激、机体的生理变化和对外界环境刺激的认识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，而认知过程在里面起着决定作用。

读者诸君不知道是否还记得“垮掉的一代”的教父威廉·巴勒斯。1957年，《在路上》的作者克鲁亚克和《嚎叫》的作者金斯堡去巴黎，两人帮他整理了《赤裸的午餐》的书稿，《赤裸的午餐》1959年出版，主要讲述作者漫游、吸毒、性乱的经历，有人认为“他是以幽默的形式抨击社会的伪善，探寻人心荒唐的一面，富有深刻的道德内涵”，另一撮人则认为它是“一堆不知所云的垃圾，一片精神病态的呓语”。1965年1月13日，波士顿城还以海淫海盗罪起诉了他，并对其公开审判。同一部作品，因为认知不同，有人把它捧上天，有人把它踩在脚下，踩到腿抽筋，还不觉得解气。

所以，很多事情本身无所谓好坏，站在不同的角度，必然看到不一样的风光。假如某一天你正踮起脚尖望，碰巧看到一场跨世纪婚礼——《巴黎圣母院》里的卡西莫多迎娶西施，首先不要将“鲜花插在牛粪上”想，何不将“插”改为“长”？牛粪有了鲜花的装点，改了门头有了脸面；鲜花有了牛粪的滋养，枝繁叶茂，能生养多少漂亮的鲜花宝宝，二者共生共荣，皆大欢喜，有什么不好？